

曹聚仁曾为两岸和谈奔走



曹聚仁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为国家统一而奔走于两岸之间的那段传奇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正越来越清晰地展现于世。曹聚仁本人的文字书信，其亲友及有关工作人员的回忆文章以及各种官方和半官方的历史文献，都为我们不断认识那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然而从客观地确认历史事实这个角度看，对相关历史档案的挖掘整理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工作。

在查阅美国国务院解密档案时，笔者发现一份 1958 年金门炮战期间美国驻台“大使”的电报，电文中涉及曹聚仁当时在两岸之间的活动踪迹，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根据笔者目前的了解，这份电报在迄今的曹聚仁研究中尚未见提及。

作者:曹忻
《世纪》编辑出版

庄莱德电报的背景和内容

这份电报的发报人是当时美国驻台“大使”庄莱德（Everett Drumright）。收报人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费耳特海军上将（Harry Felt）。该电报于 1958 年 10 月 6 日发自台北。这份电报的背景是，1958 年 8 月 23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金门炮战以后，国防部长彭德怀于 10 月 5 日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从 10 月 6 日起，主动停止炮击 7 天。停火期间，允许台湾方面向金门运送供应补给，但必须以没有美军护航为条件。当天，美国国务院急电美驻台北“使馆”，要求报告对彭德怀文告的反应。这份电报即为应此要求而发的回电。收报人中包括了费耳特，应该是由电报内容涉及第七舰队护航问题。

电文一共有 4 点，现将其中与曹聚仁有关的第三、第四两点译为中文，大意如下（第一点和第二点只谈及美军护航问题）：

三、前些天由一名香港人曹聚仁给“外交部长”和蒋经国的几封信中已经预告了共产党人的提议。关于这些信件的消息在这里被严格保密，只有极少数高层官员知道并且（此处有不到一行字未予解密）毫无疑问曹是共产党人的使者，在 1956 年他也作为使者起过类似作用，向蒋经国发过几封信提议和平谈判。当时由于曹的提议在香港被泄露，蒋经国曾发表公开声明对和谈等事予以否认。

四、通过对曹的提议进行粗略研判可看出，所提的条件表面上很诱人，其实是矮化台湾为共产党中国的附庸。即使不考虑蒋介石决意不与中共直接谈判与接触这样一个事实，这些条件对于蒋介石也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很难相信共产党人真的认为台湾政府会接受曹的信中所设想的条款。由此我的结论是，这不过是共产党人为表示具有灵活性和愿意通过谈判以和平解决海峡危机和台湾问题所作的姿态。它也代表了共产党人为了撇开美国的一种努力。

一份较早的官方解密文件

由于和谈过程本身所特有的秘密色彩以及当事双方的守口如瓶，曹聚仁为两岸和谈而奔走的这段历史一直蒙着神秘的面纱。随着曹本人书信和亲友回忆逐渐披露以及若干重要历史文献如《周恩来年谱》的出版，这段历史的真相正逐渐浮现。但是，对此事持怀疑态度者始终大有人在。例如同为曹聚仁老友，曾任台高官的马树礼先生就曾断言“绝对没有这回事”。这份解密的电报，其立场与观点暂且不论，所描述的事实，从一个特殊的第三方角度，为确认这段史实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直接证据，同时还解释了为什么位高如马树礼先生者会认为此事不可能。现在我们知道，由于电报中提到的严格保密，马树礼先生的确看不到这些信件。

在此还应当提到另外一份比较为人们所熟知的美国解密历史档案，即美国中央情报局完成于 1971 年 12 月的关于两岸接触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分析总结了 1955 年至 1971 年中情局所掌握的两岸接触情况，其中与曹聚仁有关

的占了相当大的篇幅。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学者林孝庭在对冷战时期两岸关系的研究中，对这份报告作了较深入的介绍。如果从史料的角度来比较这两份美国解密文件的话，中情局报告信息量大得多，综合性地反映了美国情报部门的信息获取加工及研判。因为是回顾性研究，结论性分析也比较多。而本文所讨论的美驻台“大使”电报，着重于一时一事，但时间上却早了十几年，且更接近于原始史料。就笔者所见，涉及曹聚仁活动的美国解密档案中，这份电报应该是年份最早的。

在这份电报中，庄莱德就有关两岸和谈的若干问题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判断。例如，曹聚仁的使者身份，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和谈的动机，蒋介石对两岸和谈的态度，以及对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具体条件的评价等等。由于本文重点在于对曹聚仁为两岸和谈奔走这一历史事实的证明，限于篇幅对这些主观判断不可能作过多的展开讨论。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庄莱德的这些判断除了受限于其当时当地的立场以及信息来源之外，还有可能受到由中美文化历史政治不同而产生的隔阂所带来的影响。实际上，从后来的中情局报告可以看出，美方情报部门的观点是有微妙变化的。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美国出于自己的战略利益，显然不会乐于看到两岸和谈的成功。而两岸在互动中则不可避免地必须考虑美国这个特殊的第三方的存在。尤其是台湾国民党方面，因为完全依赖美国，所以在互动的每一步须顾及美国的反应，总是希望避免激怒美国，有些时候又想借以增加手中的筹码从而获取美方更大的援助。台湾国民党方面对和谈的态度和应对，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往往还取决于美方对两岸接触是否知情。所以从研究两岸互动关系的角度，搞清楚历史上美方何时开始掌握两岸接触的详情，是一个令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由中情局的报告可知，美方最后基本上掌握了两岸接触的详情。但是由于该报告是回顾性的综合分析，从中无法了解美国究竟何时做到这一点的。一些研究者只能作一些推测。例如，学者林孝庭在一次专访中谈到金门炮战停火前后两岸领导人之间的默契互动时，曾推测说：“而我认为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情报部门掌握了两岸之间秘密往来的讯息。”而本文介绍的庄莱德的电报在这方面恰恰提供了时间点的信息。我们看到，美国情报部门在金门炮战停火时（或者更早些时候）已经掌握了两岸往来的信息，这个事实比推

测更进了一步。

“狡兔三窟”其来有自

笔者注意到，在介绍曹聚仁背景时，美国中情局报告中提到“周恩来曾经说过，由曹聚仁代表北京如果得不到蒋经国信任的话，那么蒋经国就无人可信了”。该报告另外还有一段提到，“我们了解到曹聚仁 1958 年 12 月在一次私下谈话时说，由于未得到台北的回应，北京的和平尝试已经‘终止’了。（但是实际上 1959 年又恢复了）。”读到这些不禁令人感慨系之。所感慨者，不是这些对话的内容，而是其发生的场合。

试想这些对话如果确实发生过，一定是在相当私密的场合。这说明中央情报局的“关注”几乎到了无远弗届的地步，凸显出当年美方对两岸秘密接触的不安程度，从而也不难想象出曹聚仁当时所处环境之莫测。由此看来，曹聚仁胞弟曹艺的回忆文章中“狡兔三窟”之说，当属其来有自。

几十年以后的今天，人们谈论起那段历史，大多乐于于个中的神秘与传奇，而往往忽略了曹聚仁如显克微支笔下的灯台守，多年如一日，为国家大计而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大勇。其实这才是梦坡公蒋畝精神的薪火传承。



1957 年曹聚仁与妻子邓珂云在庐山合影



1958 年遭到我方炮击后的金门岛海滩